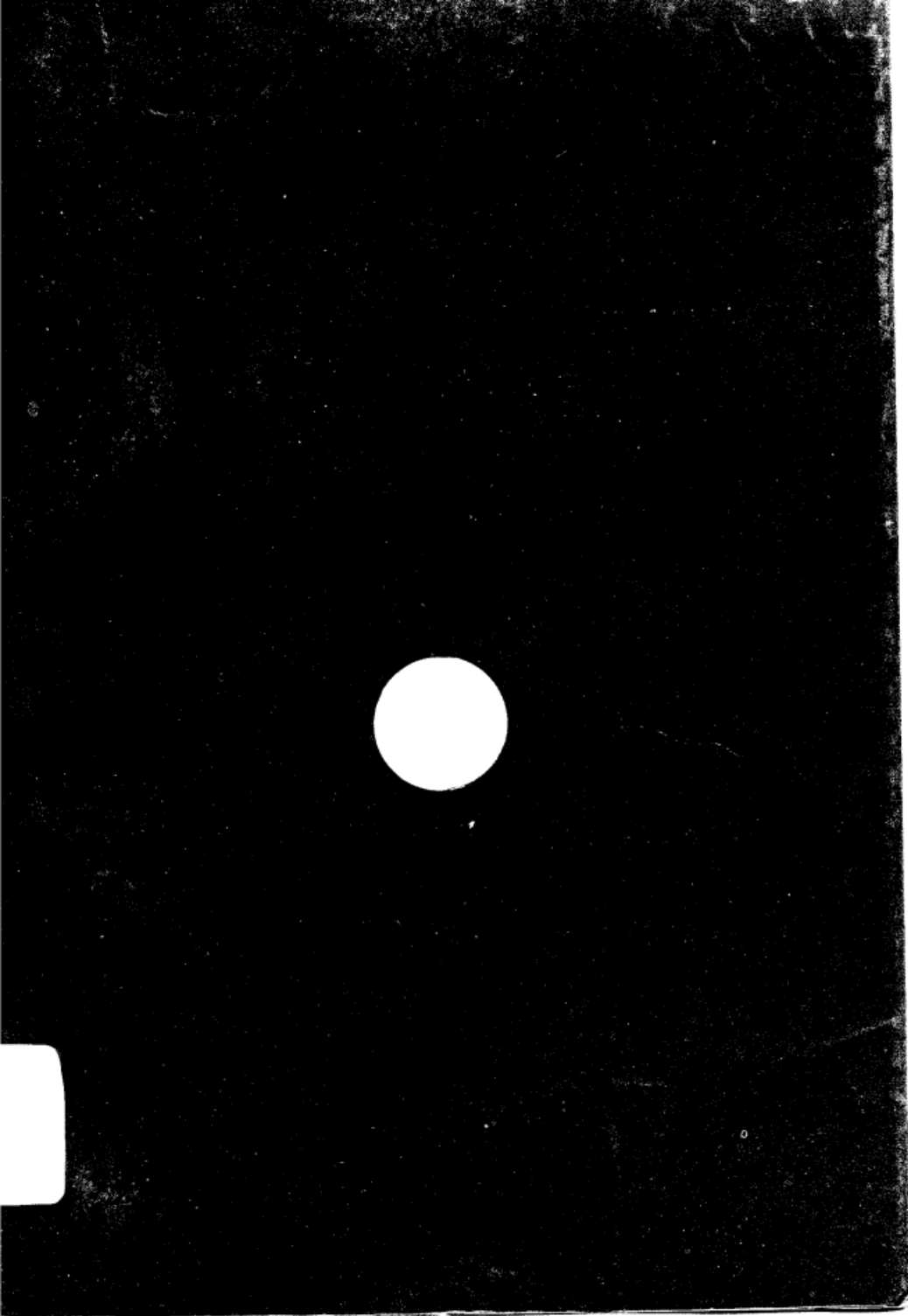




〔内蒙〕新登字1号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

金 应 熙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印刷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字数: 410千

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4-02748-5/K·213 定价: 12.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教授生前在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讲授“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课程的讲稿和笔记，由其子金雨雁整理而成的。金应熙教授学识渊博，他在通读数以千计的国外学者有关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融汇、概括其精粹，分各个时代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概况，夹叙夹议，重点评述国外学者一些有名的著作和连贯的观点，以及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供史学界学者和史学爱好者借鉴和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了解国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意义····· (1)

第二节 国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 (11)

第三节 有关国外一些史学机构和流派的简介····· (21)

第一章参考书目

第二章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国外····· (33)

第一节 研究中国神话传说的资料问题····· (33)

第二节 中国神话的特点····· (40)

第三节 中国古代神话的融合和演变····· (44)

第四节 中国神话同邻近国家和地区神话的关系问题····· (49)

第五节 中国神话的专题研究····· (55)

第二章参考书目

第三章 谈谈国外对前秦史的研究····· (66)

第一节 甲骨文字学与商代历史····· (67)

第二节 有关商周社会性质的讨论····· (77)

第三节 青铜器与西周历史····· (89)

第四节 列国并立的春秋时代····· (96)

第五节 有关战国史的几个论题·····	(105)
---------------------	---------

第三章 参考书目

第四章 引人瞩目的国外学者有关秦汉史专题的研究···	(121)
----------------------------	---------

第一节 对汉初社会情况的不同估计·····	(123)
第二节 对汉代豪族的研究·····	(133)
第三节 原始宗教的形成·····	(142)
第四节 秦汉人民反抗运动的专论·····	(152)
第五节 汉王朝经济政策的演变·····	(160)
第六节 汉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初探·····	(168)

第四章 参考书目

第五章 国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	(187)
-----------------------	---------

第一节 国外对魏晋南北朝世族研究的述评·····	(189)
第二节 国外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几个特点···	(200)
第三节 佛教的广泛传播与佛教、道教之间的 剧烈斗争·····	(209)
第四节 寺院经济概述·····	(219)
第五节 民间宗教与民众起义·····	(228)
第六节 民族融合——民族关系的走向·····	(236)
第七节 “土”：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特殊 阶层·····	(247)

第五章 参考书目

第六章 国外隋唐史研究论述·····	(265)
--------------------	---------

第一节 国外隋唐史研究概说·····	(267)
第二节 隋与唐代前期的政治·····	(278)
第三节 从隋代到唐初统治集团的构成看其社	

会发展趋势·····	(288)
第四节 唐代前期的经济制度及社会结构·····	(298)
第五节 唐代的田庄·····	(307)
第六节 唐代的佛教·····	(314)
第七节 唐代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324)
第八节 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	(335)
第九节 唐代中、后期的中央政治和藩镇制度·····	(345)
第十节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	(353)
第六章 参考书目	
第七章 国外宋史研究几个专题的探讨·····	(379)
第一节 各国研究宋史的概况·····	(381)
第二节 宋代经济上的重大变化·····	(392)
第三节 宋代的城市研究·····	(402)
第四节 有关宋代的所有制与社会性质的讨论·····	(411)
第五节 宋代皇权与士大夫·····	(421)
第六节 宋与辽、金、西夏的关系和少数民族 政权的盛衰·····	(432)
第七节 国外研究宋、明“新儒学”的简介·····	(444)
第七章 参考书目	
第八章 国外元、明、清史研究简介·····	(472)
第一节 元代史综述·····	(474)
第二节 明代史综述·····	(485)
第三节 清代前、中期历史综述·····	(497)
第四节 明、清经济史研究简介·····	(505)
第八章 参考书目	
后 记·····	(53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了解国外对中国古代史 研究成果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具有灿烂辉煌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变化和发展，史籍浩瀚，丰富多采。中国珍贵的历史遗产，向来是国际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外国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称为“汉学”。早期的汉学中心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荷兰的莱顿（Leiden）等。稍后，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沙俄等欧美国家也相继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讨，使“汉学”研究蓬勃兴起。自50年代以来，日本、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汉学”研究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掀起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高潮。

近如日本，远至欧美，许多国家都拥有相当雄厚的研究力量，人才辈出。如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及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 Bernhard）等，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与中国著名的前辈历史学家陈垣、陈寅恪齐名，并称为一代汉学大师。目前，不少中青年外国学者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形成一个整齐的研究层次。当今国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趋向是涉及面相当宽，课题相当广泛。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关系，还是在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等诸方面，国外学者都具有比较深的造诣。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不断展开争论，以理服人，气氛热烈，富有启发性。了解和吸收国外学者的成果，对于改进和发展

我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提高我们研究的质量，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这并不排除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详尽地占有材料，运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以及有鉴别地、有分析地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充实自身，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由于“左”的思潮所影响，中国历史学界在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曾经出现忽视以至否定国际史学研究成果的倾向。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各种研究观点，无论良莠，一律被看成是反面教材。在大部份的学院和科研机构里，有关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期刊被停止订阅。中国学者中谁人附和、肯定甚至是介绍国外学者的观点，都会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和思想奴化，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潮引导下，中国历史学界一度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没有了解、没有比较、没有鉴别，没有思考。只有一个模式，一种论点统治了一切。于是，中国的历史研究可以凭主观任意臆造，“指鹿为马”的现象比比皆是。古代的“儒法斗争”，不但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历史，而且扩展到世界历史，扩展到现代中国的每一个领域。“影射史学”大行其道，一时间，整个中国史坛被搞得乌烟瘴气。这根本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恰恰相反，这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现在，这种做法虽已得到纠正，但其带来的恶果却使人痛心。

首先，这造成了有关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史图书资料配置方面的畸型状况。在广东，在国内各地的许多图书馆，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社会科学方面的外文期刊杂志缺刊严重，有的竟然整段期间全缺，现在要补充亦很困难了。新版的社会科学外文著作也很不完备。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专著只闻其名，却找不到其书。要想多看一些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图书资

料，往往要跑到北京。北京各图书馆馆藏的这一方面书籍比较多一些，但是有时候到北京也找不到所需要的书籍。这样，我们对国外的研究动态缺乏应有的了解，看不到别人的成果，听不到别人的意见，史学研究的新信息所知不多，史学研究的新图书资料也不全，其发展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一度呈现出落伍之势。

其次，由于对国外研究情况了解不多，我们的研究工作便带有某些盲目性，有的落后于时代，有的陷于重复，有的则因误解了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而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这严重干扰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妨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例如，我们有部份史学工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研究的那段历史或专题，国外有哪些专家研究过，进展如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都不很清楚。于是，我们研究的内容往往与国外学者相重复，走的研究路子往往也是跟着别人后面跑。有的问题已经有国外专家学者作过深入的论证，举出很多理由指出原来的论点有错误，而我们还是照样说；有的问题我们所引用的材料，所针对的靶子，都是十年前乃至几十年前的，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我们却所知甚少，纠缠于表面上的不断论争，写出的文章观点陈旧，似乎不是近作，还讲老话。有的甚至打错靶子，闹出学术的笑话。

1970年，苏联出版了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太血统的历史学家鲁宾(A. Robin)所写的一本书，书名为《古代中国的个人与社会》，实际上这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先秦史和先秦思想史的一本论文集。书中着重对春秋战国时代代表儒、墨、法、道四家思想的孔子、墨子、商君和庄子等四位古代哲学家进行了论述。鲁宾的观点肯定孔子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保留了中国古代城邦国家的原始民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定义。鲁宾对法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法家

属于极权主义的派别，要使人的个性人类文化以及创造力都服从于专制式国家的需要。法家主张运用刑法而不是伦理道德来维持极权统治，是一种典型的军国主义理论体系。鲁宾还谈到：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论争，是代表中国古代城邦国家和集权制国家的两种统治形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而这种斗争的结局对中国古代史来说是悲剧式的。鲁宾的观点遭到了苏联历史学界主流派的强烈反对，抨击鲁宾观点的文章频频见诸于报刊。鲁宾夫妇还因此被视作“不同政见者”而受到排斥，以后更被苏联的“克格勃”软禁起来，失去了研究和写作的自由。但是，为了与苏联论战，我们的一些文章却把鲁宾作为苏联修正主义史学的典型，说鲁宾是“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宠儿”，“鲁宾的观点是苏联史学的代表”。抓住其一点，无限夸大，上纲上线，这样就违背了事实，打错了靶子，造成了非常之坏的影响。1976年6月后，在美国人的多次干预和帮助下，鲁宾夫妇移居以色列，鲁宾到特拉维夫的西伯莱大学当教授，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讥讽我们的作者，其中谈到：“当中国人批判我（鲁宾自指）的时候，我夫妇俩正在苏联失去自由。”由于我们对国外的学术研究动态了解不够全面，“孤陋寡闻”，在学术研究方面缺乏严谨性，带有“形而上学”的态度，所以吃了哑巴亏。

再举一个较早期的例子：在五、六十年代时，中国历史学界曾就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们的许多学者都对日本学者铃木俊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其根据是铃木俊先生发表在1935年日本《东亚杂志》第8卷第4号上的文章《论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文中的观点认为：唐代“均田制”基本上是“限田”，政府并没有将田授予人民，所谓“还田”、“授田”是空的，“均田令”是一纸空文。然而，我们的许多学者没有看到过铃木俊先生的原文，更没有看到铃木俊先生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新的

见解，就凭我国一位学者在论文中引用了没有正确表述铃木俊先生意思的一段话，抓住铃木俊先生说过“均田令”是一纸空文，便批评他全盘否定唐代的“均田制”，并就此写了不少的论战文章。实际上，铃木俊先生在《东亚杂志》第8卷第4号上所发表文章的意思并不是说唐代“均田制”整个制度都是空的，只是说“还田”、“授田”是空的。1951年，铃木俊先生在日本《史渊》杂志第50号上发表了《论唐代均田法施行的意义》一文，更鲜明的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唐代的确实行过“均田制”，而且与租庸调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列举了很多资料来引证自己的观点，其阐述已无拖泥带水之感觉。诚然，根据考古和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唐代的“均田制”在实行过程中，“还田”、“授田”也曾经出现过，是否有大范围的普遍推行，则是史学界尚在讨论中的问题，铃木俊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商榷的。但是铃木俊先生并没有否定过唐代“均田制”。全面地评价他的学术观点，他还是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持基本肯定态度的。我们对他的批评，实际上是因为对国外学术动态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会。铃木俊先生在1980年把他自己有关上述各方面的论文辑集成书，书名为《“均田”、租庸调的研究》。其中还谈到了这件事，说起中国同行们对他所持观点的误会。他在重申了自己的见解以后，希望中国同行们能够系统地了解他的学术观点。

忽视国外史学研究动态的重大“后遗症”还在于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得不到传播，以至我们的史学研究队伍中普遍存在着知识面不够广，视野不够开阔的弱点。我们有的史学工作者研究问题只专一个方面，关起门来讲得头头是道，然而一但离开了教科书的“框框”就变得一筹莫展。尤其是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就会感觉到“山外有山”，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都是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许多具有一定深度的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们尚未能够透彻了解的。相对来说，我们新一代的研究队伍，

思维不够敏锐，论证不够严谨，缺少贯通中外，站得比别人高的宏观控制功力，又没有兢兢业业深入到每一个微观专题探索的韧劲。因此，我们的研究面显得狭小，表现在研究手段不多，深度不够。长此下去，我们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子会越来越窄，新一代研究人才的培养，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忽视乃至否定国外史学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其恶劣的影响尚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不仅妨碍了中外学术交流的进行，损害了我们对新一代史学研究队伍和严谨学风的培养，还延缓了中国历史研究事业发展的速度，拖慢了中国史学界向历史研究新高峰攀登的步伐。这种状况，不改变是不行的。

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了解国外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逐步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承认。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沿海各个省份的社会科学院，都相继建立了情报研究所，注意收集、翻译和分析国外比较新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所需要的参考资料。国内有关介绍国际上中国史研究最新动态的刊物亦陆续创刊。这些刊物在各研究单位和专业人士中广为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尤其值得欣喜的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中国的历史学工作者有了与国外史学界同行们直接接触、了解和交流的机会，能够第一手得到国际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信息。现在，我们举办学术性的会议，大都邀请国外的同行们带文章前来参加，就大家所关心的论题，展开认真的探讨，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国外举办学术性的会议，我们亦想方设法争取出席，珍惜与国外同行们进行交流的每一个机会。我们有些专家还应邀到国外讲学或作专题研究，通过使用国外充裕的外文书籍与资料，同国外史学界的同行们交流观点，启发新的思路，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质的方面有所突破，踏上了更进一步的

台阶，其收效颇为理想。

本着探索、求实的精神，中国历史学界的同仁们开始重视对国际历史学界研究成果和新的史学方法论的了解和吸收。近来，郝镇华先生编辑的《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庞群先生写的《小议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姚全兴先生写的《要重视国外史学方法论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等专著和论文，都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国同仁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向，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趋向。我们相信：学术研究是有共通性的，只有结合许多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汇聚成一条学术的巨流，奔涌向前。

我们对于国外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动态和成果，不但要认识，更重要的是要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以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这才应该是我们了解国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要旨。

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历史的真谛。这是一个尊重事实，不断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我们应该是无所畏惧的。与国外历史学界的接触、交流和比较，全面了解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对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只会有帮助，不会有损害。因为与国外同行们相比较，我们亦具有自己的长处：

在立场和观点方面，我们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通过不断地吸收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便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演进作规律性的探求，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研究。

在材料方面，中国古代历史资料极其丰富。尤其是新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和古文献整理工作的进展，源源不断地为研究中国古

代史提供新的资料。这些宝贵的资料，为我们做好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研究的路子方面，我们亦具有特点。我们熟悉祖国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人情。对浩瀚的中国古籍各种资料能够运用自如。只要我们加强对新一代史学工作者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国外史学工作者新开拓的领域里，勤勤恳恳地耕耘，作更为仔细，更为深入的探讨，就一定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子来。

我们相信，中国人研究自己祖国的历史，具有使命感、事业心和自豪感。只要我们虚怀若谷，不懈努力，一丝不苟，深入钻研，就会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应该有信心。

我们读外国学者的论著，从了解到融会，从鉴别到吸收，都必须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历史事实为根本；经过自己深刻的思索和探讨，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国外专家学者们的观点。我们既不能把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说得一无是处，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盲目迷信，“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就全面照搬。偏激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把握分寸，认真研究，尊重科学。这样，才可以避免片面性，从整体上深入了解国外学者已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全貌。以达到扬长弃短、去粗存精，“洋为中用”的目的。

现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首推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所撰写的多卷本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5年），李约瑟教授对中国古代科技各门学科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旁征博引，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以他的“大手笔”写出了这部大部头的专业巨著。就他一个外国学者，能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作如此深入的研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李

约瑟教授的论述从横的方面通过中外之比较，展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优势；从纵的方面贯通古今，一脉相承，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这部书从整体上是成功的。

李约瑟教授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宣布过：起码应该要具备六个条件才能够写好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六个基本条件依次是：

第一，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而且还必须从事过实用生产方面的科学研究。

第二，必须熟悉欧洲科学史。

第三，必须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科技发展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第四，必须在中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体验过生活。

第五，必须懂得中文，至少也应该不借助别人能够查阅原著以及其它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第六，必须有幸得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具备上述六个条件是不容易的，故此李约瑟教授的研究是值得我们赞许和学习的。

然而，就是这套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权威性著作，我们读的时候也不可以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应该精于思辩，在这良好的基础下深入研究，沿着前人所开拓的路子，探索前人未探索的论题。最近，中国学者龙奎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杂志1980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李约瑟教授上述著作第5卷第2分册内有关道教和炼丹术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其中指出了书里一系列的偏差，有的地方搞错的竟有好几页。李约瑟教授是研究科技史的专家，具备了相当良好的基本条件，也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努力，还得到了好几位有名的中国学者的帮助，这样一部颇有水平的专著，还会出现这些偏差，别的著作有错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说另一位以研究明史著称的外国学者海格尔(Hucker)，他写了一部中国通史著作，题为《中国人的过去》。这本书编撰得不错，其优点是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去写社会文化，所写的份量较重，研究亦有深度。而我们许多中国学者所编撰的中国古代通史著作，对比起来其文化部份就显得比较单薄，一般只是在叙述完每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历史之后，寥寥数语，简短的一段话，笼笼统统地概括几点，就算了事。实际上这是很不够的。中国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珠玉纷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应当占有较为重要的篇幅。故此，海格尔的著作在这一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相当突出，是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借鉴和吸收的。然而，海格尔先生有时过份自信，引用中国古代诗词均不用别人翻译、解释和校正，全部要自己动手搞，结果出现了不少的错漏。例如，他在翻译唐代诗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中的名句：“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时，就有望文生意，断章取义的解释。再有，这位被称为汉学“后起之秀”的学者，竟然把大名鼎鼎的“皇上”唐玄宗，说成了“玄妙的宗义”，闹出了笑话。这些错漏无疑给海格尔的这部中国通史带来了瑕疵，亦反映出国外一些学者的中文水平存在着弱点。

以上的例子说明：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一定的长处，亦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对于国外学者，既不能苛求，也不能盲目追随。需要我们以认真的态度去读书、去了解、去鉴别、去分析，不拘守传统学说，不盲从，通过吸取别人先进的、有用的观点，摒弃其错误的观点，从而使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推动力，这就是我们了解国外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动态、方法以及成果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国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

国外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经验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本节谨从五个方面介绍国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新特点，供读者借鉴：

第一，国外不少学者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诸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计量数学、高等数学、心理学、气象学……等的研究方法引进到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去，从而收到拓展新领域或提出新见解的效果。

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史丰富多采的方方面面，从而增加历史“立体性”的感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往往会在各门学科的边缘地方发现新问题，而新问题的突破点，也往往就在这些跨学科的交界处，西方和日本的学者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曾举办过一次以“自宋代到1900年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作主要论题的中美学术讨论会。会上，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am G. Skiney）和郝若贝（Robert Milton Hartroeu）就分别对中国古代史后期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论点。

施坚雅，斯坦福大学教授，早年曾是研究泰国华侨史的，后来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到中国明清史方面来，他把经济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的功能学派、计量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就不应